

■作者·编者·读者

## 我为什么写《红火与悲凉》

□石湾

当我写完《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书稿时,正值2009年6月,忽然想起,自我2004年6月从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休,至今已经整整5年。我并不恋栈,但5年来,也许是几十年凝聚的文学编辑情结,文学出版界的历史云烟和时代风潮,依然时时刻刻在牵动我敏感的神经。尤其是2007年,《文汇报》发表的一篇“四大名编”的故事”,一下子触发了我要为我所景仰的前辈名编立传的心愿,我也选择了四位名编,即萧也牧、江晓天、李清泉、王朝垠,写成了《也说京城名编》一文。拙文在2007年10月7日《文汇报》上刊出之后,接连有多位文学界的师友打来电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还有些未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打电话来问我我那期报纸看。而那时我尚未收到样报,就想先找一张给病得已骨瘦如柴的江晓天看看。我找到邻居李兴叶先生,怎料他说:“这张报纸我不能给你,因为你写的四个名编中,有两个是有恩于我的,江晓天是我在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工作时的领导,还给我的长篇小说《帝国的草原》三部曲写过序。我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又是他推荐给李清泉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但对他俩在文学编辑事业上的成就我过去了解不多,所以,你这篇文章我得好好保存起来……”过了些天,我又遇见他,再次说起这篇文章。他说:“可惜《文汇报》只能提供给你一个整版的篇幅,让人看得不过瘾。你能不能在此基础上,扩展成一本20万字的书呢?”

我当即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这是因为《也说京城名编》原本写了近两万字,除了萧也牧、江晓天、李清泉、王朝垠,还写了张羽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名编,但想在报纸上发表,就不得不“削足适履”,压缩到一万余字,所以才使他读罢有了一种“不过瘾”的感觉。然而,有精彩故事的京城名编何其多矣,即使是写二三十万字,恐怕也写不周全,无论遗忘了谁,都是一种不该原谅的憾事。于是,我就想,不如单写江晓天和萧也牧当年带领的那个出色的编辑团队。写这个团队的理由,我在《也说京城名编》一文的开篇,就提到了:

上世纪末,我在参与“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编辑工作时,发现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入选的长篇小说共六部,除《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外,其余四部,即《红旗谱》《创业史》(第一部)、《红岩》和《李自成》(第一卷),都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此期间

## 刘玉山的美术天地

在我置放座右铭的地方,悬挂着一幅80公分宽、65公分高的大色块拼积的彩画。高远之处铺满殷红,似是辽阔天空;左下一片浓绿,似是从天俯瞰之广袤森林;右下凸现赭黄,似是移自秦晋高原;其他小块点染其间,似喻世界之多色;做涌动状的,似是白浪翻腾。这是刘玉山送我的手机作画,由我放大之,配金色框,置于东墙上,我以油画视之,可寄托心志,陶冶性情,开阔心胸也。只是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接近他创作的初衷。但就某种艺术美学而论,艺术的意义不就是艺术创造与艺术鉴赏之间的双向建构吗?

我曾经多次观摩刘玉山的画展,一次在美术馆,一次在美术学院,两次在宋庄水墨艺术的现实,以及用以寄托光辉未来的美与力的交相和鸣呀!刘玉山告诉我雕塑所用之花岗岩石采自山东泰山。“泰山红”质色艳美,是颇负盛名的泰山之石。新四军军帽、工人帆布手套、野菊花都是依据实物模铸而成,使人倍感质朴素,各感真实,同时诉诸情感与理智,容易感动人心。一束山里野菊花,使这种对先辈的纪念和感恩,具有为松柏、牡丹等高洁、富贵之物象所难于充分表达的人民性、民主性的思想道德光辉,表达得震撼人心!四中校友刘玉山、四中校长刘长铭以及其他参与此事者,做事认真,思考缜密,寄意遥深,确乎令人感动——他们懂得如何以最具吸引力的艺术方式,对学生施以潜移默化化的历史、文化以及审美的教育。这应该是教育家和艺术家联袂创造的近年来崛起的校园文化中的奇葩。它在北京四中百年校庆之日揭幕,使它以磅礴的历史情思和深刻的感召力载入史册。任何心智正常和善于思考历史的人经过它的面前,都不会无动于衷。揭幕时刻,我本人亦曾肃然而立,脱帽致敬,亲身感受它对自己的无声的洗礼。宋庄水墨艺术空间刘玉山画展开幕,霍然想起他的这座雕塑,想象中重睹芳华,又有刘玉山、刘长铭在侧,深感这座平易肃穆的雕塑,对一代代四中学子的成长必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文化引导人类,此之谓也。

戈壁滩上的胡杨。画中胡杨拦腰折断,恰成人字形构图,树之两侧一深一浅,一明一暗,左侧粗干斜立,右侧虬枝无存;断裂处,上有断茬分明,下有骨肉相连。背景苍茫,一片凛冽的蓝。胡杨造型,如人腿之分立,坚实稳重,寓意不以单纯讴歌大自然的生命力为限;或可同时寓指人被大力击倒,稍作喘息,即重新崛起,这又分明构成一个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香港政府驻京办事处任晓洁女士曾作诗赞扬这幅水墨胡杨:雷落九天意欲杀/风摧大漠万重沙/铁干横断犹不死/虬枝无存蓄新芽。画作墨黑遒劲,构图简洁,色彩明丽,气势磅礴;诗作得其神韵,“铁干横断犹不死,虬枝无存蓄新芽”,可谓画龙点睛,锦上添花,成为绝配,诚然好诗。此胡杨不妨看做我们民族永不衰竭的旺盛的生命力和永不屈服于苦难、打击的刚烈、柔韧的民族性格的一种象征。

香格里拉的老妈妈。这幅水墨画以雪山为背景。老妈妈妈脊背之上是大垛的金黄的秋叶。那雕刻着劳动者几十年

入选的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只有孙犁的《白洋淀记事》,也是出自中青社。由此可见,那时中青社的文学编辑实力,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然而,中青社担负文学图书编辑工作的,只有一个编辑室,江晓天、萧也牧当年分别是编辑室的主任和副主任。他俩诲人不倦,手把手地带出了张羽(《红岩》责编)、黄伊、毕方(《创业史》第一卷责编)、王扶(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一批优秀编辑,形成了一个精诚合作的集体,在抓稿、编稿方面自有一套非凡的功夫。

兴叶很赞赏我的这个采写方案。于是,我就先奔江晓天家,开始了采访和资料的搜集工作。老江很谦虚,说:“你就不用写我了吧,集中精力先写萧也牧吧。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红旗谱》的责编,《红旗飘飘》从刊的创办人,‘文革’中又为保卫《红岩》被整死了,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不是其他名编辑可以替代的!我觉得,你能为他立传的话,比写一个开国时的将军或省委书记还要有价值。”

老江这番真诚的话,对我启发很大。于是,我的采访和资料搜集工作,就先围绕着萧也牧进行。可是,当一些重要的采访线索接连中断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动手太晚了。最了解萧也牧的张羽和黄伊已不在世了,等我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和萧也牧的大儿子联系上时,方知萧也牧的夫人李威也在我准备采写这本书时含恨长逝了。加上一些杂务的干扰,使我的采访和搜集材料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一年,仍未能开笔。直到见到张羽的遗孀杨桂凤,得知张羽生前曾想写《萧也牧传》。她把张羽当年采访李威、康濯等的一批采访记录慷慨地提供给我之后,我才得以掌握了许多珍贵的史实,揭开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真相,开始了《萧也牧悲剧实录》的写作。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丁玲、冯雪峰对萧也牧创作倾向的那场批判运动的来龙去脉,我终于梳理清楚了。而当当代文学史上的这场公案,丁玲一向是以胜利者自居的。直到我的《萧也牧悲剧实录》在《江南》杂志上刊出上篇时,我在首都图书馆借到刚上架的(红笔一枝谁与似——丁玲)一书,发

风雨劳作备显力量的双手被处理得十分突出。劳动的喜悦和母亲的仁慈构成令人感动的老妈妈的面部表情。温暖的色调笼罩着整个画面。仁慈和勤劳构成中国母亲至尊至贵的伟大品格。有了这位母亲形象,刘玉山的画作,作为一种系统,便显得完整了。这位仁慈而勤劳的“母亲”和罗中立的那位沧桑而坚毅的“父亲”,我以为可以比肩而立。

水墨江南水乡。小桥流水。沿河而建的黑瓦白墙的村舍。石板路。支在船上的渔网。撑船的女人。牵着母亲手的孩子。黄昏牧归的鹅。迷蒙的林木。铺满橙黄色、宝石绿、淡灰色的阳光的天空——一派农村传统建筑风韵,一片温暖、安详、古朴、悠久的江南水乡情致。刘玉山曾经慨叹:这是即将消失的美。现代城镇的现代之美,或许真是要建筑在传统之美的废墟之上了。在我看来,物质的历史将被淘汰,精神的历史需要留下。否则,一味地新陈代谢,一味地弃旧图新,历史将不成其为历史,人会变得浅薄、轻浮,教典忘祖,华丽而空洞。刘玉山作画重感觉、重直觉,但这种江南水乡水墨,却是挽救即将被迫告别社会舞台的一种富于东方文化魅力的美的自觉行动。其实艺术直觉也是一种艺术思维。它看重表象的、瞬间的、突兀的、灵光一闪的灵感爆发,但它不会完全脱离理性思维而孤立存在。对于艺术而言,直觉激发灵感,理性滋养灵感,直觉直接化作形象,理性使其通往思想,它们不是有你无我的二元对立,而只是在不同场合,在统一体中有所侧重而已,既有质的区别,又有深层次的联系。

与蒙复旦合作设计,由广州雕塑院制作的海伦·斯诺夫人像。这位美丽、高贵的美国妇女,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抗日战争时期来到中国,并创作《续西行漫记》,以同情中国抗战的立场和充满感情的笔触最早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救亡图存的正义战争。她被艺术家塑造得端庄、秀丽、挺拔、优雅、坚毅,目光深邃而蓄满力量。夫人头上的贝蕾帽,手上的皮手套、肘弯的披肩、束腰的连衣裙、半高跟的秋日皮鞋,都是夫人当年时尚的装束。斯诺夫人对中国的感情,令人感叹唏嘘。她曾作诗云:“我死后,让我永远向着东方”。中国人懂得感恩,懂得怀旧,会永远铭记这位伟大的美国女性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铜像造型极富质感,自然流畅,人物形象光芒四射,美轮美奂。这是海伦·斯诺夫人应得的荣誉。2009年11月,专程护送斯诺夫人铜像的安成信、刘玉山、蒙复旦一行到达斯诺夫人的家乡南犹他州雪松市。这天成了雪松市以中美友谊为主题的盛大节日。南犹他州州长、雪松市市长、中国驻美大使馆领事,均出席欢迎会并讲话。斯诺夫人的侄女上台拥抱了刘玉山。海伦·斯诺夫人铜像,随即安放在南犹他州雪松市中心区,成为雪松市第一个由中国人创造的中美友谊文化景观。

占据《刘玉山作品集》封面半壁江山的现代派风范的水墨画《女人和果实》。那硕大的、突露三指的手,不是写实派画家看到的小巧玲珑的女性手,而是留在敏感的艺术家人眼中关于那真实的手在某一时刻的瞬间印象;一股飘扬的秀发,几乎遮住半个脸庞,直垂胸前,以粗重黑墨勾勒脸部轮廓线,收获夸张之效。樱桃小口,有常人眼睛十倍之大却偏又不见一丝眼白,其眼神任你想象的眼睛,使这个年轻美丽的女性形象更显现代风貌。置于画面左下侧的那个嫣红、粗朴的苹果,内涵上与女人形象构成相互映衬关系;少女与果实,美丽而成熟。形式上打破人体的单调与孤立,一粒放大的三角形光斑和简单的红色平涂的苹果,构成具有立体感的阳光下的苹果的真实造影。一种简约的、多彩的、热烈的、开放的、张扬的美扑面而来。刘玉山的人体画不似写实派画家人体画之惟妙惟肖,却更多意态的、思想的和形式的美。他人体不是模拟式创作,而是创造式创作。这不仅是方法论上的区别,而且是艺术感觉的差异与艺术观念的分歧。这幅画可以作为研究刘玉山创作的现代性和个性化特征的一个成功例证,用做画册封面不是偶然的。

这些美术作品,可以列入当代优秀的美术作品行列。在这些优秀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传统写实派艺术对刘玉山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的影响和后起的现代派绘画对他的强烈的、发展性的、个性化的影响。刘玉山最好的作品是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带有开创性的作品。启功先生热情肯定了他的这一艺术特点,称道刘玉山“推陈出新,七彩缤纷,不论肤色,都是美人”。



原中青社文学编辑室部分同事合影。前排左起为萧也牧、张羽霖、张羽、王立道、江晓天、韦钟秀、毕方,后排为唐微凤

现在这本厚达476页的传记中,竟还是把对萧也牧的批判放在《为了新中国文艺的繁荣》一章中。读罢此文,更使我感到,我动手写这本书尽管晚了,但毕竟是为把当代文学史中这页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尽了绵薄之力。

遗憾的是,我未能在江晓天在世时完成他的嘱托。虽在写成《萧也牧悲剧实录》之前,我陆续发表了《<红旗飘飘>的创刊与停刊》、《<红日>是这样喷薄而出的》和《一部<红岩>血凝成》三篇文章,记述了他和萧也牧带领的那个团队所开创的部分红火的业绩,但直到江晓天病逝半年多后,我才写出《江晓天的编辑生涯》,完成了整本书的写作。行将搁笔之际,我不只叹息他们悲凉的命运,更感受到了他们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和奉献精神。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中真正的精英,我为有萧也牧、江晓天这样杰出的前辈同行而感到骄傲!与此同时,回顾这本书相当艰难的写作历程,也感到历史上的许多现象以至细节,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采写他们的故事,我往往会联想到自己曾经历过的创业艰辛、奋斗坎坷和成功喜悦。可以说,我是在写前辈的命运,品自己的人生。我相信,文学编辑和广大读者的心是相通的,萧也牧、江晓天他们编辑出版的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优秀文学作品,曾经哺育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那么,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神圣的职责和悲剧的力量,也一定会鼓舞我们去开创光辉的未来,迈向更加崇高的人生境界吧!

■土地与生长

## 时代的故乡

□白岩松

中国正处在历史上变化最激烈的时代,每一个中国人虽然在其中改变着命运,却也不得不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随波逐流。

于是,太多的当代人,似乎首先没了故居,接下来没了故乡。人的生活半径变得比以往大得多,诱惑在哪里,哪里就是新的家。但是,这里,会是未来的故乡吗?

我们的心灵又在何处安放?去年的夏天,我带着四个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来到我的故乡呼伦贝尔。那是草原上最好的季节,而对于飞机落地之前的客人们来说,却未必是内心最好的季节,每个人都忙,在北京这个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往往还未激烈争斗,就已感觉筋疲力尽,疲惫与焦虑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写在人们的脸上。

草原似乎不是药。当这批人真正地行走在绿色的草原上,呼吸着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时,奇迹似乎发生了,我从他们的表情上判断,大家都已不像中年人,而像回到了少年。

在草原上的第一顿饭,酒还没有喝,当敬酒的长调响起时,一个孩子的妈妈瞬间泪流满面,这时,我知道,她落地了,心灵终于松弛下来,她已回家。

虽然我知道,呼伦贝尔只是我的家乡而不是她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更多的人都被草原感染,都已松弛下来。每一个人心中,原来都有一个草原,这呼伦贝尔,分明是大家的故乡,甚至就是这个时代的故乡。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一片大自然的绿色,而《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一首歌。到了呼伦贝尔,总会有人在唱,你会不止一次地听到,然后觉得,没有比这再好听的旋律了,于是,这首歌与这草原就再也分不开。

而现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又变成这样一本书,在作者巴义尔笔下松弛,清新,充满有趣的细节。它从大自然进入,然后行走在历史当中,就如同这一片土地,仿佛简单却又深藏不露。一年四季变幻的颜色,如同历史中变幻的大旗,让你不会感觉单调,当然,也不会像现代人一样的自大无比。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美,不仅在于上天的给予,更在于一代又一代人的滋养,历史是枝最好的笔,负责认真地刻画了一切。

人过四十之后,总有人问我:你的故乡和草原对你意味着什么?

我回答:那是我少年想离开而现如今每时每刻都想回去的地方。

2010年10月11日 星期一

福建作家刘登翰来信来电,嘱我为老友袁和平的文集写一篇序言,并认定“这篇序只有你来写最合适”。读到登翰的信,下意识地想起1997年11月7日,我兼职《诗刊》主编刚到任,突然接到登翰电话,说和平逝世了。这是我到《诗刊》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居然就是和平的噩耗,斯时和平48岁,与今年中秋前夕刚刚辞世的《诗刊》副主编刘希全同龄,莫非48岁是优秀作家生命的一道坎?

收入本文集中150万字的著述,可以看出和平的兴趣所在。他擅写长篇、中篇小说,对报告文学也有兴趣,同时文化随笔亦有涉猎。和平的知识结构很杂,天文地理、诸子百家、收藏绘画,乃至阴阳占卜等,无所不精,而他最上心、下功夫最多的却是环境保护问题。如今环保已是一门显学,可二十多年前大家关注的热点绝不在此,这显示出了和平目光的锐利、见地的超前,也让人们看到一个优秀作家超越时空的才情。

和平、秦文玉、我和范向东,四人曾同居北大一间学生宿舍,我与和平上下铺而卧,每当夜静,室友闲聊,均以和平为中心。他那时魁梧壮硕,且有过内蒙古草原放牧的生活经历,见多识广,文玉、向东多年在西藏,我故乡在内蒙古而成长在云南,大家共同话题极多,聊得兴起,便买啤酒小菜,快活地喝上一通,那真是段让人怀念的时光。在这个班集体中,和平是班长,文玉是支部书记,所以我戏称自己是“党政一把手”的室友。如今文玉、和平均先我而去,想来不禁黯然神伤。文玉因车祸在福建去世,和平当时也在车中,还有另一位作家陈章汉。文玉走时是在1994年的10月,刚刚46岁,我与和平把他推入火葬炉中,然后看着一缕白烟过去,文玉变成一捧骨灰;这一幕不料想三年后又在和平身上重演: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场景,甚至敛骨灰的都是同一个人。自此之后,我陡然感到自己对生命有了一番彻悟。两个好友兼兄长的壮年辞世,在展示生命残酷一面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该时不我待地做些该做和喜欢做的事,否则……

和平文集中的这些文字,莫不凝结着他的心血,有些文章(譬如中篇小说《佛手》)我曾替他誊抄过,因为那时没有复印机,和平求我抄稿时很腼腆,但谁叫他是我的班长、兄长兼偶像呢!遂快乐为之效力。这部中篇后来发表在《十月》上,一度影响很大,因为和平把对茶文化的研究心得全熔铸在这部小说中,后来他还把我们几人邀请到铁观音的产地——福建安溪进行实地考察,一路品茗一路赏秋,遂记住了几个地道的茶名:秋香、黄金桂。和平先后为培养我的茶趣、赠茶具之外还不断附上茶叶,所以在喝茶方面,他是我的导师。

和平的长篇小说《蓝蓝》和《南方的森林》是最能体现他本人艺术追求的,他和我一样喜爱前苏联作家普列什文和巴乌斯托夫斯基,我们曾就这一现象进行讨论,这二位是风景描写大师,从和平的小说创作中,能读出这种师承。一个外貌粗犷豪迈的汉子,内心却细腻温柔,落在纸上的文字,又透着南方的水气和雾岚,甚至有着森林深处的清香,这就是袁和平的魅力。

和平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在他离去的日子,中国和世界乃至文坛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但和平生前曾坚守并追求的那些理念,譬如环境保护、美丽心灵与自然的融合、天人合一、茶禅一体和快乐原则等,没有因时代变化而变异,反倒让人们更加认可和珍惜,从这个意义上说,袁和平并没有走远,他就在我们中间,而且将伴随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历程,在悠远深邃中凸显出一种力量。

## 乌镇的魂

□邹海仑

乌镇的魂,  
摇摆 in 船家割悍的身影里  
竹篷船霍然一转,船尾剪开一河新绿……  
乌镇的魂,  
氤氲在蓝花酒盅浓烈的醇香里  
蓝宇的酒旗随风摇摆,召唤着八方热爱生活的人们……  
乌镇的魂,  
叮咚在银匠清朗的锤声里  
佩在孩子胸前寄期望,戴在情人手上写甜蜜……  
乌镇的魂,  
潋滟在水边人家的门墙上  
伸伸缩缩的波光,把梦和诗从白天一直编织到夜里……  
乌镇的魂,  
扑打在染坊百尺竿头  
欢乐的彩布,从少女的怀抱直通青天云霓!  
乌镇的魂,  
悬挂在老胡开文笔店  
三千枝新笔催动千军万马,激荡起流畅豁达的文气!  
乌镇的魂,  
凝结在茅盾老主编故居的墙壁上  
那向你瞩望的殷殷目光,已经望了一百年  
未来的一千年,还会年年岁岁  
瞻望下去……  
乌镇的魂呀——  
乌镇的魂!  
当我在河边茶楼上凝神静坐的一小时四十分里  
你被那穿堂而过、鼓荡不已的“千里快哉风”  
吹进了我的心胸  
从此在那里坐定 坐定,  
永世不移!

注:茅盾曾担任《世界文学》杂志第一任主编,本诗作者现为该刊编辑。



江南水乡速写(水墨画) 刘玉山作

原上年  
刊头题字:臧克家

·第121期·